

百越民族史第十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向春

由百越民族史研究会、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局联合主办,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办的“百越民族史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10月12日至14日在鹰潭市举行。来自北京以及福建、江西、浙江、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近6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38篇,分别就崖葬、干越的历史与文化、百越与海洋文化的关系以及百越与汉族的族群互动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交流,并对跨世纪的学会工作、百越民族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及学术研究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崖葬及其所关涉的民族史、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及科技史等方面的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崖葬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其地域范围与古百越地大体重合,因而其族属当为越;龙虎山崖墓年代久远(为春秋战国时期,仅次于武夷山悬棺葬)、分布密集、保存完好、文化内涵丰富,在中国崖葬文化圈内占有重要地位,展示了干越的社会生活、信仰习俗与科技水平。关于悬棺升置技术和方法,与会者普遍认为不可能只有唯一的一种,提升法、垂降法、脚手架法等各种技术方法都有可能,不同地理环境和时空背景中的崖葬可能采取不同的方法。崖葬的特点多具有“水”的因素,反映出江海民族的生存环境与文化心理。从时空构成上看,崖葬基本上呈东早西晚之势,因此有代表认为崖葬起源于东南沿海地区,并渐次向西南流传,大体上是溯长江而上,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崖葬文化圈的形成,是文化传播或民族迁徙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对崖葬的讨论在某些方面已超越了以往对其族属、年代问题的简单追寻,如强调对民族志材料(包括现当代中外民族志)的搜集和比较研究,关注到从悬棺葬到斜坡洞葬再到平地葬的内在发展逻辑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变迁和族群互动关系,提出了悬棺葬“越源汉流”的观点并凸显了汉文化因素和宗教信仰因素在崖葬流变过程中所充当的重要角色。

对于“干越”问题,与会者经过讨论达成了更多的共识,并对干越的历史文化及其对中华古代文明的贡献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干越是以赣东北地区为活动中心的百越的一支,与其东的于越、其西的扬越为不同的支系,并共同构成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越人的主体。干越土著文化一脉相承,同时也受到中原及吴、楚因素的影响。龙虎山崖墓所反映的正是干越人的丧葬制度、宗教信仰乃至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干越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其鲜明的地方特色为中国青铜文明的多元共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更具启发意义的是,不少与会者以江西为着眼点论及了南中国地方传统的族群背景,讨论了干越、山越所形成和维系的族群力量及其对江西地方发展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把地方史的叙述纳入到民族史的框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百越民族史的内涵。

百越与海洋文化关系密切,探讨百越海洋文化的结构与继承变异是本次会议的另一重要论题。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百越海洋文化可归结为由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组成的“二维结构”,前者包括水稻种植、舟船航行、渔捞作业及干栏建筑等,后者包括鸟、蛇崇拜,鸟田、羽人信仰及饭稻羹鱼、舟船祭祀、纹身习俗等,两者相辅相成,对越地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本次会议还就总体上的百越史、百越文化、越汉关系展开了讨论,如强调百越的“多源多流”,注重以汉人为主体的封建集权国家对族群关系的重要影响,指出古代百越民族是南中国汉人的最主要来源等。这些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部分与会者提出,民族史的研究不能抛开“国家”的大背景。传统中国国家体系的建构过程包含两个方向上的维度:以汉人为主体的王朝政权的“外拓”和非汉族群的“内化”,两者构成中“中心/边缘”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华/夷”观念贯穿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国家不仅是一个权力实体,同时也是一种象征资源,围绕这一资源展开的争夺决定了传统中国族群“边界”的动态本质。同时,国家体系对边缘的渗透并不一定意味着汉人的大量迁入并取代土著而成为主体,土著族群为求得生存而认同国家、认同汉文化并由此而“化夷为汉”是一个恒常现象,因此,探讨这一现象的机制、过程、相应的历史叙述及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应该成为民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百越民族史的领域正是实践这一学术思想的广阔天地。

此外,即将跨入新世纪的学术团体与学术活动如何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更好地契合社会需求,为经济建设服务并同时获得自身健康发展的动力,也是本次会议所关注的一个话题。通过与当地旅游部门的合作,本次会议的成功经验为探讨地方经济发展(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学术研究相辅相成、互为推动的运作模式提供了借鉴。

总之,以深入稳健的传统研究为基础,结合理论方法更新的激励,是本次研讨会的特点,也是其成功和价值之所在。通过广泛的交流与对话,与会者达成了以下共识:包括百越民族史在内的传统民族史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举世公认的,但同时也面临着新时期学科发展的挑战。民族史的研究应该广泛吸纳、借鉴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志、社会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和理论方法,摆脱传统取向上单一“追根溯源”模式的束缚,在发扬传统学科优势的同时,不断拓展新的领域,以期获得更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黄向春,1968年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讲师。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邮编361005)

〔责任编辑 华祖根〕